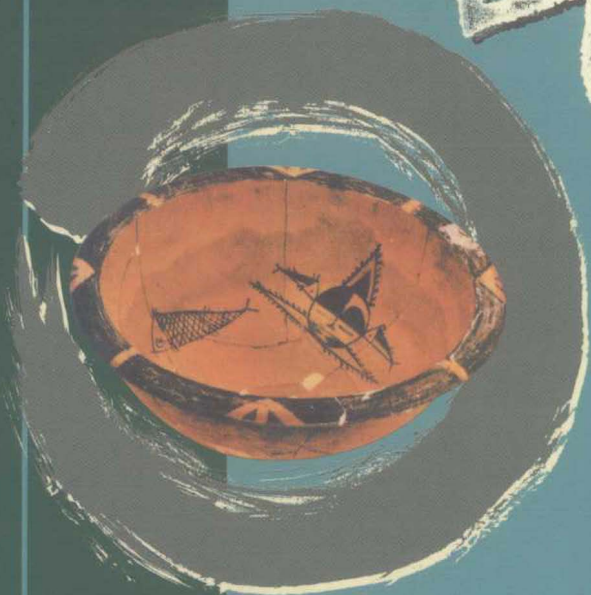


中國

文化的發展過程

● 許倬雲 著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

許倬雲

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

許倬雲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1992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201-554-9

1992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994年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2000年第一版第三次印刷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upres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n Chinese)

By Hsu Cho-yu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2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554-9

First edition 1992

Second printing 1994

Third printing 2000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uhk.edu.hk/cupress

Printed in Hong Kong

迎許倬雲教授到新亞書院講學

林聰標

新亞書院的創立是基於幾位創校先賢對高等教育的理想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念。創校初期筭路藍縷，經濟物質條件極端貧乏，在「手空空，無一物」的環境下，他們仍然以「千斤擔子兩肩挑」的豪情，為繼承中華傳統，以發揚及創新中國文化偉大抱負為己任。錢賓四先生創建了新亞書院，並且擔任了十五年的院長，為新亞書院的發展奠下了一個長久垂遠的基礎，也在香港高等教育史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

在金耀基先生任新亞書院院長期間，為發展新亞傳統特色，構想多種推動長期性學術文化活動的計畫；其中以設立與中國文化有關的「學術講座」為首要目標，並發起「新亞學術基金」的籌募運動。在多個學術講座的構想中，首先成立「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首次講座，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舉行，當時邀請錢賓四先生由台灣來港親自主持。講題是：「從中國歷史來談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一連六講，成為當時學術界一大盛事。

本講座自一九七八年舉辦以來，已達十屆。先後有李約瑟(Joseph Needham)先生、小川環樹先生、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先生、朱光潛先生、陳榮捷先生、楊聯陞先生、余英時先生、劉廣京先生、杜維明先生。每屆講座，不但是新亞以至中大的校園盛事，也是香港學術界的盛事。

今年適值錢賓四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很難得邀請到與錢賓四先生同鄉的著名當代史學家許倬雲先生來校主講。許先生自幼即深受賓四先生啓發，在學術觀點上，對賓四先生特別仰慕推崇，不僅是當今學術界的適當人選，而且更具有特別的紀念意義。

一

許倬雲教授，江蘇無錫人，一九三〇年出生於福建廈門鼓浪嶼。中學就讀於無錫輔仁中學，承襲了江南無錫「讀書切實、做事認真」的學風傳統，此時即致力研讀同鄉前輩錢賓四先生的名著《國史大綱》，私淑錢先生，這對他日後的史學根基與治學態度有很大的影響。一九五三年及一九五六年，許先生先後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及文科研究所；隨即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在台大就學期間，許先生隨李宗侗先生治社會史，李濟之先生治考古學，董作賓先生治年曆、曆法，勞貞一先生治秦漢史，凌純聲先生、芮逸夫先生

治民族學，沈剛伯先生治西洋史；在名師的教導下，奠定了深厚的治學基礎。一九六二年取得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台灣擔任史語所副研究員（一九六二——一九六七年）、研究員（一九六七——一九七〇年），並任台灣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及歷史研究所所長（一九六二——一九七〇年）及教授（一九六五——一九七〇年）。一九七〇年應聘赴美任匹茲堡大學歷史系及社會學系教授，一九八三年榮任同校校聘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迄今；一九八〇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八六年獲選為 Phi Beta Kappa 榮譽會員。

二

以學術造詣言，許先生鑽研中國五千年歷史，嫻熟近代西方科學，學問面甚為廣闊。從比較嚴格的學術範圍來說，他是一位中國古代史家，專精周、秦、漢三個朝代。他的主要著作中有專書三種，即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先秦社會史論）、*Han Agriculture*（漢代農業）和《西周史》，論文集二種：《求古編》、《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求古編》收到一九八〇年發表的論文，以後仍不斷有論著在學術期刊登載。估計他的中文著作達百萬言，英文專書及論文無數，以六十歲的盛年，累積如此大量的學術成績，可見其生命力之活潑和創造慾之旺盛。

三

許先生的學術論著範圍以兩周到兩漢爲主，所探討的課題環繞著政治結構、地方力量和農業經濟。周是中國古典文明完成的時代，也是傳統兩千年文化的基礎和泉源；漢是傳統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形成的時期，二千年來政治社會的基本骨架在乎其中。所以這兩個段落是了解中國歷史基本性質最緊要的環節。許先生曾說，他的研究範圍牽涉到三種時期，一是形成期(formation)，一是定型期(crystallization)，一是轉變期(transformation)；前者見性格的發展方向，中者是特殊個性的定型，後者則爲過渡的過程。這三個時期的研究，體現在許先生三種主要的專著中：《西周史》主要探討以文化爲概念之華夏民族的形成期；《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則討論古代世界過渡到普世國家(universal state)和普世文化(universal culture)的過程；《Han Agriculture》更進一步分析維持中國這個普世國家兩千餘年傳統社會的經濟基礎結構。

許先生的歷史論著主要探討中國歷史上兩大課題，一是中央政府與地方社會力量的衝突和融合，二是農業與商業，亦即城市與鄉村的互補與聯繫關係。近年來，他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指出親緣團體、精耕細作與文官制度爲構成中國歷史發展的三原色。許先生認爲

中國不像兩河流域那種以地緣爲結合的方式，而中國在商代的政治單位是兩種平行的系統，一是地區性的邑，一是親緣性的族；到了西周以宗法取勝，邑變成族的附屬品。周代選擇以血緣來結合人羣，這個選擇形成中國很大的特色，中國政團的擴大就是以親緣的團體擴展而成的。反映在辭彙上是「天下一家」，國與家不分，這種擴張可以造成普世的帝國，而這個普世的帝國是建立在親緣關係上的。親緣關係的排他性很强，但中國歷史可以超越這種排他性而產生「民胞物與」、「民吾同胞」的觀念。中國以親緣來帶動擴張的需求，這是其他文明體系所沒有的特色，表現在社會關係上，親緣關係是所有關係的基因。

論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精耕細作與市場經濟如車之兩輪相輔並行。許先生認爲中國農村並非遺世孤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而是坐落在廣大市場網絡的小環節；透過網絡的鉤連，各環節互通聲氣。小網絡匯集於小鎮，大網絡以城市爲綱，大小環節既有生產與消費的關係，疏通的網絡自然就產生物品與人力的調節作用。因此，商業未必是壓迫農業的罪魁，城市也未必成爲剝削鄉村的禍首。他更進一步指出：

自從韋伯談到資本主義以後，大家往往從倫理、工作意願等方面去討論，而疏忽了純經濟的角度。爲甚麼中國沒有走向資產化？在純經濟的角度，也就是從精耕農業的角度來看，資金一方面是分散的，不容易集中；另一方面，資金長期束縛在小塊農地

上。精耕細作的農業，經常需要改良土壤以維持生產力，需要長期的資金投入，大量資金遂沒法轉化為別的東西，這是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們不能單單討論觀念就忘記純經濟的因素；反之，經濟行為脫不開觀念，所以雖然我們談的是農業經濟、精耕細作，還是要提醒大家了解任何一個歷史現象沒法完全切開，都要聯繫在一起的。（《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頁三十三）

許先生強調的另一個中國文化的基因特色是文官制度（bureaucracy）。中國的文官組織來源久遠，完備、複雜的文官系統理論早在《韓非子》中就出現了。在長期的演變過程中，文官制度是國家與社會鬭爭的制衡角色。中國的文官制度不僅有工具的合理性，而且有儒家意念滲和其中，這是韋伯在討論西歐自十六世紀以來的文官制度所缺少的一環。儒家意念如果祇當作意念系統，可能會成為教條，任何東西若變成教條就會神祕化，走上信仰的途徑，而不走理性辯論的途徑。儒家意念作為目的而論，可以相當於基督教意念，是一種信仰；可是反過來講，儒家意念並不是上天的神諭，而是經世的使命，在這點上儒家意念的神祕性並不強。從這角度看，目的的理性與工具的理性配合，使中國文官系統在國家與社會的拉鋸戰中，不但舉足輕重，而且成為國家和社會之間的聯繫力量，這個特色是中國以外的史學家在討論文官制度時未能理解到的。

四

自從早年運用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概念來解析春秋戰國的變革期以來，許先生近三十年中努力倡導借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尤其是社會史。他指點學子們注重與檢討Max Weber, S.N. Eisenstadt, William Skinner, Charles Tilly, 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的理論，而他本人更是應用社會科學理論來研究歷史的成功例子。他常自謂「雜家」，頗有「泰山不辭土壤，河海不捐細流」的氣概。方法本是雙刃刀，善用可以制敵，不善用反而傷己。這些年來台灣以社會科學方法研究史學的結果或成或敗，其功過得失歸之個別學者的機緣，但許先生有倡導之功，則母可否認。他的研究取向從近代中國社會史學來看是頗有意義的。近代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以馬克斯學派為大宗，許先生的努力推介新方法和新理論，多少奪回一些園地，這種力挽狂瀾之功，也是不容抹煞的。

五

一九六二年許先生榮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這是台大歷史系畢業生取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社會變動之研究」得到海內外學術界極高的評價與讚許（這篇論文修訂後在一九六五年由史坦福大學出版，即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一書，至今仍為治

中國史的學子所必讀的著作)。許先生在完成學位後，立刻回台灣，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及台大歷史系。在主持台大歷史系系務的八年間，許先生身處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仍然堅毅的抗衡權威勢力，致力維護學術研究的獨立自由，得以開創出台灣這二十多年來歷史學研究教學的新方向，可說是厥功甚偉，彌足矜式。

在此期間，許先生一方面輔助史語所所長李濟之先生與台大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先生，參與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中國東亞學術委員會、中美學術合作委員會的工作，為中國學術發展竭盡心力，規劃國家學術發展之方略，努力把台灣的學術研究提昇納入世界的學術圈內。

另一方面，他又致力於革新台大歷史系的課程與教學，開啓了歷史系每一斷代史分由二人以上講授的先例，這種平行與交叉的課程設計，使歷史系的課程安排有了斷代連貫的新義。同時透過開日本、韓國、蒙古、土耳其、越南及東南亞各地區歷史課程，著重漢民族與各周邊文化圈的發展關係；更以美國、英國、俄國、印度等別國史的講授，進一步把中國史與世界史連貫結合起來。

在推動台灣史的研究上，許先生更是不遺餘力。他自己對十八世紀宜蘭地區開發史的研究，可說是一拓荒之作，他邀約方豪、陳奇祿先生，首創台灣史研究會，定期集會；並竭力

爭取東亞學術基金會及哈佛燕京社的資助，對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的大批檔案資料進行分類提要和整理保存工作；在台灣史研究的推動鼓舞與人才發掘培育上獻替良多。時至今日，台灣史的研究已蓬勃開展，蔚為風氣，則二十多年前許先生的擘畫推動之功實不可沒。

此外，在許先生的任內，台大歷史系成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為國家培養了第一批擁有高級學位的史學人才，其成效影響至為深遠，本院遼耀東先生即是出身於台大歷史研究所而取得國家歷史學博士學位的第一人。在中研院史語所，許先生更襄贊李濟之先生主持《中國上古史》一書的寫作計畫，在這個大型計畫項目下，網羅了當世名家學者，以專題撰文方式深入探討中國古代史，開創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新方向，其成果已先後由中研院史語所出版，這可說是中國史學界首次大規模集體合作撰著的嘗試。

六

在過去幾年中，許先生連續利用休假期間，回台灣指導年輕一輩的學子，他先後在中研院、台大與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在他的精心籌畫之下，組成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透過這種workshop密集研討的方式，激揚了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風氣與水平，使國史研究開啓一個嶄新的趨向。

近年來，許先生更參與籌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並負責北美委員會的業務推動。經由這個基金會，希望把中國研究提昇至國際水平，終極目標是要以中國人的力量來推展中國文化，對世界學術文化提供更大的貢獻。這是一項高瞻遠矚的壯舉，而許先生苦心襄贊擘畫，貢獻心力智慧，實在功不可沒，這是很值得在此特別提出來的。

七

許先生是一個歷史學家，他熱愛國家，關懷社會，愛生命與人生。他以超越肢體障礙的無比毅力，涵養出憂國憂世、悲天憫人的胸懷與謙遜待人的風範。他的專業是學院的歷史學者，但更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他承襲了中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所謂「安能居牖下，白首太玄經」。中國士人一向秉持是非分明的良知，以弘毅任重的抱負自期，謀道不謀食的氣節自勵，是以正言議論，以求匡救時艱。許先生論及秦漢知識分子，特別表彰董仲舒之流的理想型人物，當亦與景行之思，而有所自我期許之義。然而歷史學家往往認識有餘而進取不足，此因參透世變之後，多一分悲憫便少一分激越。許先生的歷史識見既然不離「溫和中庸」的基調，他多年來的政論風格——不比黨、不阿諛，婉而約、肯而切也就在意料之中了。這正是學術素養投射在現實生活的結果。如果對於這種溫柔敦厚的諫諍之言還聽不

進去，要等到甚麼樣的結局呢？

他的高足杜正勝先生引古人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以爲歷史學家如許先生而言，這種憂世心情尤其親切深刻。

八

許先生與香港學術界素有淵源，一九七〇年他曾應本校前校長李卓敏先生之邀請，與當代名史學家Herbert Butterfield, William H. McNeill兩人對本港高等教育多所獻替建言。他們並在香港共同主持一個講座，闡釋中國史與世界史的交流匯通問題。此次更接受中文大學的約請，在百忙中應邀來本校歷史系擔任講座教授，任教一學期，這實在是本校的榮幸，從此莘莘學子有此良機可以聆受教益，同仁得以切磋論學，誠屬難得的機會。尤可道者，許先生與賓四先生誼屬同鄉，在學術觀點上，許先生自幼即深受賓四先生教誨啓發，對賓四先生特別仰慕推崇。這次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在錢先生辭世後首度舉行，我們特別約請許先生來主講，不僅是當今學術界最適當的人選，而且在此時此地，更具有特別的紀念意義。

九

近年來許先生發願從比較文化的觀點與角度，努力探索中國歷史的特色，並與世界歷史

作一綜合對比，誠如他所說：

中國歷史，在國內幾乎是史學園地的全部，在國外則是大天地中的一個角落。其實，中國歷史的時間長，史料也相當宏富，應該是比较歷史學中主要參考組之一。可惜因為現代史學是由西方史學傳統發展的，中國的歷史至今仍祇是漢學家耕耘的土地，還未引入現代史學的主流。國內外的史學工作同人，尚須共同努力，將中國歷史發展為世界史的一部分。我自己願為這個任務，盡綿薄之力，祇盼同志日多，則中國歷史可作為解釋世界歷史意義的重要依據。（《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自序》）

這是許先生的大願，良可發人深省。

今天我們在此熱烈歡迎許倬雲先生的來訪，我們非常期待許先生從比較文化的宏觀觀點，就中國文化的形成發展與演化轉變所作的一系列演講。無論就紀念賓四先生一生「為故國文化招魂」（余英時先生之語）的苦心孤詣，或就新亞書院承繼中華傳統、創新中國文化的理想、信念與目標來看，實在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價值意義。許先生在其近作《風雨江山》的序文中，曾特別致意於此，並且祈願中國文化有翻舊出新之一日。我們也深盼此日能早來臨。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本文由劉石吉先生撰寫，文中部分摘錄自杜正勝先生《學術與現實之間——許倬雲的省思和關懷》一文，謹此致謝。

序：中國史與世界史的若干省思

自從高中時，老師吩咐我仔細研讀《國史大綱》，即受賓四先生的影響。在大學進入歷史系，固然由於對文史夙有興趣，也由於從《國史大綱》看出了一些可以摸索的途徑。及至賓四先生返台定居，遂更得不時向這位鄉長請求訓誨的機會，但終究未曾有足夠的時間追隨左右，所得也就不如長期從學的及門弟子。今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邀請我主持「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遂與此間同仁討論了三次。三次講演，均在補綴中國文化發展的脈絡，仍未離開賓四先生關懷的範圍。題目固在中國，視野卻時時涉及世界史。為此，特將一篇前時演講代替序文，希望讀者能了解我從中國歷史瞻望世界的若干觀念，當有助於理解以下三篇講稿的重點。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內容豐富，資料繁多。治中國史者，在中國史的範圍內，有左右逢源的樂趣，也有心勞力絀的痛苦，是以中國史的園地，遂自成天地，一旦置身其中，即難得再有探首牆外的興趣。這一個世紀內，西洋史學已經介紹於國人，西洋史也是歷史課程的一

部分。然而本國史及西洋史（有時雖名為世界史，實則仍是西洋史），兩者之間，各守畛域，罕見流通，毋論史學觀念，即使史實的同步比較，也不常見。

從另一方面看，歐美各處討論世界文化的演變，無不由西歐本位著眼，甚至世界史的分期，所謂上古、中古、現代三分法，也莫非由西歐的經驗抽繹而來，於是以西歐的分期強加於世界其他地區文明的發展過程，遂有扞格不通之現象，殆屬不可避免。今日在美國史學同行中，覺察到這種弊病者，已頗有之，也有一些嘗試以世界性角度治世界文化者，如湯恩比廣泛討論二十一種文明興衰起伏，又如麥克尼爾以超越國界的角度，或則以人類為整體現象，由疾疫傳染以觀其不可分割之情形；或則視人類社會為超大型生物體，討論其資源與能力之間的關係。此皆聲聲可觀的大家，然而，他們終難完全擺脫西歐本位的立場，未能由世界性的實例抽繹歷史發展的諸種異同。

我在海外任教，與同事討論時，每覺有另闢蹊徑的需要，是以不揣愚陋，嘗試從中國史的發展中抽繹若干現象，與其他主要文化發展相比較，以求其異同，再進一步歸納若干較為一般性的抽象原則。以下即為若干管見所及，以請同仁教益。但務祈同仁了解，凡此原則，祇是觀察演變軌跡的角度，絕對不是所謂歷史發展的法則或定律。至於以中國歷史作為參考，則係由於中國歷史長期的綿延未斷，為世界上僅有的例子，而史料豐富、年代確實，則